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以昆明、兰州为例

殷燕敏, 潘艳艳, 胡实盼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殷燕敏(1956-), 男, 江苏无锡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武汉大学生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潘艳艳(1982-), 女, 湖北监利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胡实盼(1984-), 男, 安徽安庆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摘 要]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 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 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 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关键词] 城市居民; 主观生活质量; 总体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2-0271-05

一、研究回顾及研究假设

主观生活质量, 也称可感生活质量, 是人们对生活各主要方面的感受和评价。与客观生活质量指标相比, 主观生活质量指标更多地关注人们自身内在的对幸福与生活满意度的整体评价。作为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 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一直受到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西方学者大都倾向于用反映人们生活态度和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与评估生活质量, 因而他们积累了大量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 其中又以对主、客观两类指标间联系的研究最为广泛。坎贝尔(Campbell, 1976)的研究发现, 客观指标对主观生活指标的解释充其量只能达到 17% 左右。他又提出了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差距解释理论”, 即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期望与现实差距越远, 主观满意度就越低, 两者呈负相关; 而现实状况的改善与过去状况、他人状况等比较, 参照标准的差距越大, 主观满意度就越高, 两者呈正相关。Veenhoven 通过对 93 个国家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 发现 HLE (即幸福生活预期)与失业、国民收入、收入平等或者人口特征并没有特别大的联系, 教育对满足和幸福也没有影响。蒂埃纳(Diener, 1993)发现收入同主观福利的关联值非常低($r=0.12$), 当人均收入达到 6000~8000 美元, 主观性福利受益指数几乎没有变化。埃德格顿(Edgerton, 1990)指出: 对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报告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内在的性情而不是外部条件, 对生活质量的 subjective 评价与生活条件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当然, 也有些研究者得出了与上述结论相反的结论, 他们发现满足感、快乐感具有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差异(Mroczek D K.、Kolarz C M., 1998), 戴维斯也指出经济收入、婚姻情况、社会认可、受教育水平与幸福感、满足感有显著相关。

高(Kau, A. K., 1995)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也较具代表性。其研究发现, 新加坡人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最满意, 对教育尤其是学校生活最不满意。在 13 个领域中, 新加坡人对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排序如下: 健康的身体最重要, 幸福的家

庭生活次重要,工作场所良好的氛围和优美的环境第三重要;而拥有更多的金钱和物质财富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大,在所有的领域中排在最后;生活满意度与人口特征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我国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大规模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林南利用天津和上海的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得出如下结论:“决定生活总满意度的主要是对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的满意程度”(林南,1987、1989)。卢淑华、韦鲁英根据北京、西安、扬州三市抽样调查资料,探讨生活质量模式,除引入客观指标外,还增加了参照标准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一项,指出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由于参照标准的存在可能会发生分离。

国内外学者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征具有多样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有待进一步探索与比较;国内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迁,十多年前的研究结果能否很好地解释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不得而知。此外,我国学者关于不同地区主观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在查阅到的文献中,只有易松国、风笑天关于武汉、北京、西安三地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比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一方面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试图从地域文化差别和个体特征差异的角度,来比较分析我国西部两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另一方面也欲将研究结果与前人结论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差异性。

鉴于以上分析,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1:西部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地域差别。

假设 2: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个人收入)对其生活质量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假设 3:工作、健康、消费与社会关系满意度是影响总体满意度的重要方面。

二、实证资料的比较分析

(一)关于兰州与昆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比较分析

表 1 昆明、兰州样本生活满意度比较

城市	生活质量总满意度平均得分	标准差	有效样本	显著度	Eta ²
昆明	3.05	1.18	200	0.002 **	0.025
兰州	3.39	1.00	198		

说明:5=非常满意,4=比较满意,3=一般,2=不太满意,1=很不满意

**表示 $P < 0.01$;本文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均指总满意度

样本数据表明,两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平均得分都不是太高,均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但相对而言,昆明居民的满意度平均得分(3.05)要低于兰州(3.39)。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由样本所得结论可以推及总体。由此,我们接受研究假设 1,即认为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地域差别。

此外,我们还对两城市各个领域的满意度也进行了比较,在工作、休闲、个体健康、医疗卫生、消费、购物、自我能力评价、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满意度上,兰州与昆明平均得分依次分别为:(3.23, 3.30);(3.19, 3.28);(3.86, 4.01);(2.57, 2.62);(3.13, 3.32);(3.27, 3.35);(3.46, 3.60);(2.87, 2.93);(2.60, 2.79)。由这组数据不难发现,兰州居民在各个领域的得分满意度也均高于昆明,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却很弱($Eta^2 = 0.025$)。这说明单独从“城市”这一自变量的角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差别。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认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城市”差异并不是造成人们生活满意度差别的最直接、最主要因素,它可能通过某些中介因素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

那么,引进哪些中介因素能更好地解释两不同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差别呢?我们将先尝试引进一些个体特征变量来加以分析。

(二)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收入)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与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而文化程度、就业状况、收入与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则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其中,收入与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程度最强,其次是文化程度,就业状况与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度较弱。

从性别、年龄与满意度的关系看,二者都与满意度无显著相关,这与 Mroczek D K. 和 Kolarz C M. 的结论恰好相反,但支持了 Veenhoven 和 Kau 的结论。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评价上并未显示出性别

差异,这与近年来我国女性地位的提高,“男女平等”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尽管当今社会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但从观念上来看人们的思想较之以前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男女两性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目标上是相同的。该结论与“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曾慧超、袁岳,2005)的结论一致,其文中指出:不同性别的城镇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表2 各种影响因素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	显著度	有效样本
性别	$\text{Eta}^2=0.001$	0.600	398
年龄	$\text{Gamma}=0.104$	0.143	397
文化程度	$\text{Gamma}=0.120$	0.048 *	397
婚姻状况	$\text{Eta}^2=0.004$	0.487	389
就业状况	$\text{Eta}^2=0.095$	0.000 ***	393
收入	$\text{Gamma}=0.212$	0.012 *	378

说明: *表示 $P<0.05$ ***表示 $P<0.001$

邢占军(2005)则指出,有些研究显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稳,一项针对英国和美国居民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而从我们的结果看,无论对年龄进行怎样的分组,年龄与满意度之间都不存在显著性相关。造成两种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开调查内容、样本选取、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差别,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社会变迁、现代化进程加速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冲击。针对英国和美国居民的调查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我国,毕竟东西方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都有所不同。英克尔斯指出,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主观态度与客观行为两方面,例如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具有开放性)、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和信息、重视教育等等。我国虽然正逐步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的比重增加,但许多老年人尤其是中年人现代性增强,其价值观念不再像过去那样保守,他们比过去更强烈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其生活期望值、参照标准可能较之以前提高了,因而主观满意度相应变低。如此看来,年龄与满意度没有显著相关是可以理解的。

易松国、风笑天(1997)还指出,文化程度在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下与满意度呈负相关,这与我们“文化程度与满意度呈正相关”的结论又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论资排辈现象较普遍,改革开放后虽然已有好转,但“由于从观念的变迁到体制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文凭在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并不能在体制转轨之初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高学历的人虽有教育资源优势却得不到相应回报,从而产生心理失衡。但近几年来,个体受教育程度、所具备的知识技能等自致性因素在职业发展与机会获取中日益重要,教育优势得以体现,因而高学历的人其满意度更高就不足为奇了。袁岳等(2005)的调查也发现,城镇居民中呈现学历越高,满意度越高的趋势。

一般认为,婚姻是影响生活满意感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西方许多研究者也认为,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也有学者(邢占军,2003)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反,指出“从总体上看城市居民中无婚姻生活群体主观幸福感高于有婚姻生活群体”,并认为这与我国城市居民当前婚姻质量有关。从本研究结果看,已婚、未婚及其他(离异、分居、丧偶)群体在满意度方面没有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邢占军的结论,即已婚群体中大部分人婚姻质量不高(目前只有3%的中国夫妇的夫妻关系可以称得上高质量),由此其满意度也未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就业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除开生理、安全、爱与归属的需要,人们还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工作与就业可谓实现人们自我价值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样本数据显示,现在拥有工作(满意度均值为3.28)或虽然退休(3.75)但以前在工作中得到过肯定的人,比那些没有工作(2.68)、下岗(2.13)以及工作曾遭遇挫折而再就业(2.46)的人,满意度更高。

关于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诸多分歧,不同研究有不同结论,这一点在研究回顾中已有论述。但经过比较后我们发现,国外大多数研究结论其实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即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当其居民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收入的影响会递减,则收入与满意度之间的联系较弱;而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收入与满意度的联系更紧密。昆明、兰州两城市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都属于西部不发达地区,其收入与居民满意度的相关强度达到了0.212,说明在不发达地区收入与满意度确实存在较强的关联,至于其关联强度是否高于发达地区,我们无从比较,留待下一步研究。

在收入与满意度关系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样本数据中,昆明人均收入(1350元)要高于兰州(1088元),如果按照前面得出的“收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的结论,那么昆明居民的满意度应该高于兰州居民,但结果却与此相反,兰

州居民的满意度更高。心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比较理论可以解释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幸福是相对的,取决于用来判断的标准。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而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获得社会信息,即源于读到或想到的某个人或事”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十分重要。昆明与兰州虽然都属于西部城市,但昆明位于西南边陲,边境交流、对外交往相对兰州更为便利,城市旅游业的繁荣也使其更具开放性,人们接触外来事物、获取外界信息的机会更多,但与外界、与他人相比较的心理也相应增多,更容易产生不满足感;而从地理位置、对外交往看,兰州的开放性不及昆明,人们与外界相比的心理减弱,因而居民满意度反而高于昆明。

通过引进这些个体特征变量,发现只有收入、文化程度和就业状况影响到两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但从相关强度看,比预期的要小。曾经有研究者指出,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等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加在一起也只能解释快乐感、满意感变异总量的 10% 左右 (Michalos A C., 1985)。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考虑再引进一些新变量,即各分满意度来进行回归分析。

(三)关于各分满意度与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表 3 总的生活满意度对各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满意度变量名	标准回归系数 Beta	显著性水平
工作满意度	0.234	0.000 ***
休闲满意度	0.130	0.061
社会关系满意度	0.095	0.109
健康满意度	-0.057	0.353
公共卫生满意度	0.006	0.928
消费状况满意度	0.230	0.000 ***
个人能力满意度	-0.027	0.657
公共服务满意度	0.012	0.867
公共政策满意度	0.148	0.027 *
复相关系数 R	0.565	解释力 (R Square) 31.9% 显著性水平 0.000 ***

说明: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01$

从表 3 可以看出,对总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工作满意度、消费状况满意度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其它因素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工作和消费满意度是影响总体满意度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健康和社会关系满意度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本调查问卷中对健康和社会关系的测量不同于前人的几项研究:本研究中健康满意度根据“个人身体健康”和“个人精神状态”两项的平均分得出;对社会关系满意度的测量通过平均“与家人、邻居、亲戚、朋友”四项满意度得出,而前人的几项研究对健康与社会关系满意度的测量更具体、明确。公共政策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且两城市该项满意度平均得分都未超过 3 分,即未达到“一般”水准,这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关注,政府在解决贫困、下岗、教育和环境保护问题上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三、结 论

1. 昆明与兰州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着差别,兰州居民的满意度高于昆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两城市的地域差别造成的,但这种地域差异并不是引起不同城市居民满意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2. 某些个体特征的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从本研究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资源优势越能得到体现,其满意度也越高,这反映出近来自致性因素在人们的生活领域中日益重要。工作与就业可谓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而它也影响着满意度。与发达国家不同,在我国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收入仍然是影响人们满意度差别的较重要因素。不过,物质收入与人们的主观满意度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由于人们心理上参照标准的不同使得客观收入与主观满意度发生了分离,这与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3. 除了某些个体特征,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也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与许多前人研究不同的是,健康对生活质量的的重要性在本研究中未得到体现,这可能是由于问卷在该项问题上设计的不完善引起的。

4. 总体来看,西部城市昆明与兰州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都不是太高,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值得注意的是,

两城市居民在涉及宏观社会环境的领域,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公共政策方面,满意度很低,都未达到“一般”水准。这应该引起政府与社会的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一状况。

[参 考 文 献]

- [1] 池莉萍,辛自强.幸福感:认知与情感成分的不同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2).
- [2] 林 南.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模型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1989,(4).
- [3] 卢淑华,等.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2,(1).
- [4] 罗 萍.国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积极成果评述[J].中国人口科学,2000,(6).
- [5] 邢占军.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J].人民论坛,2005,(1).
- [6] 邢占军,金 瑜.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3,(6).
- [7] 易松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1998,(3).
- [8] 易松国,风笑天.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及其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0,(4).
- [9] 易松国,风笑天.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研究——武汉、北京、西安三地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
- [10] 周长城,蔡静诚.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 [11] 周长城.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2] Michalos A C.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85, (16).
- [13] Mroczek D K, Kolarz C M. The Effect of Age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Happines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5).

(责任编辑 于华东)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of Western Urban Residents: A Case Study from Kunming and Lanzhou

YIN Yanmin, PAN Yanyan, HU Ship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YIN Yanmin (1956-),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conomic sociology; PAN Yanyan (1982-), female, Graduat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conomic sociology; HU Shipan (1984-), male, Graduat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conomic sociology.

Abstract: This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QOL) between Kunming and Lanzhou. The result shows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QOL. Som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ducation, job and income) have influence on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QOL, while some others (such as gender, age and marriage)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Satisfaction with job, consumption and public policy ar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also affect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QOL.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QOL (quality of life); total satisfaction